

# 汪曾祺

## 小说精选

“从头越”

名家小说精品文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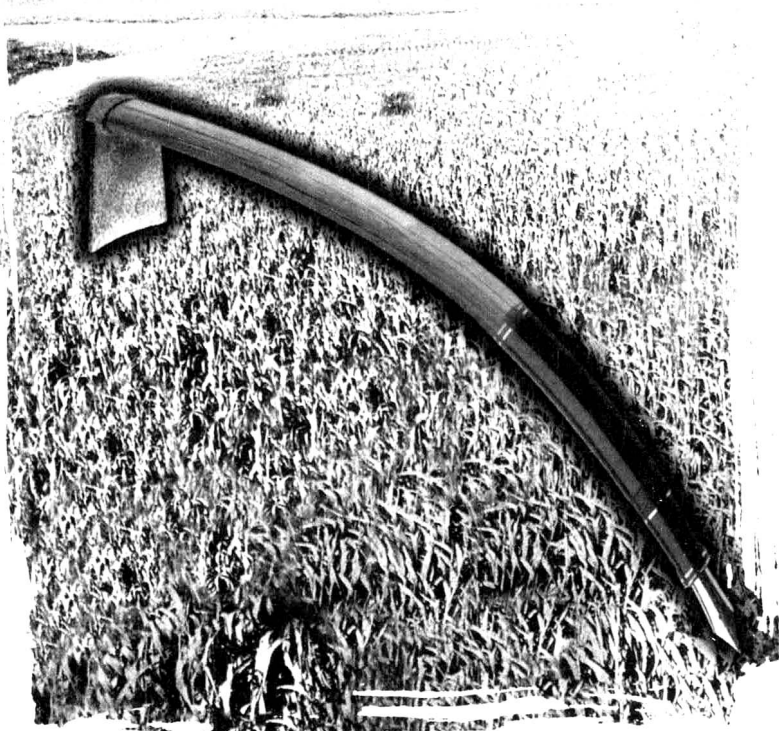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人民出版社

# 汪曾祺

## 小说精选

“  
从  
头  
越”

名家小说 精品文库

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侯安国

封面设计：廖新松

技术设计：杨 潮

责任校对：伍登富

“从头越”名家小说精品文库

汪曾祺小说精选

汪曾祺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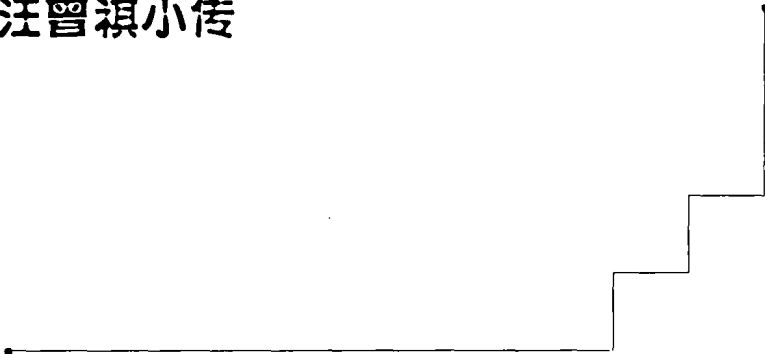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6.75 字数 370 千

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20-04493-3/I·697 印数：1-8000

定价：23.00 元

## 汪曾祺小传



汪曾祺，江苏高邮人。1920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。1939年—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。毕业后，曾先后在昆明、上海的私立中学任教。后又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职。北京一解放，随四野南下工作团到广州、武汉，最后又回到北京市文联工作。1954年，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。1950年至1958年，一直任文艺刊物编辑。编过《北京文艺》、《说说唱唱》、《民间文学》。1958年，被错划为右派，下放劳动四年。1962年初，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，直至今在。

20岁开始发表作品，现已结集者约十余部。年轻时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较深。近年来作品渐趋平实。提倡“回到民族传统、回到现实主义”。但又主张现实主义要容纳各种流派，民族传统能吸收一切外来影响。汪曾祺的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结构，然而那是“苦心经营的随便”。他的小说被称为“散文化”的小说。对于语言，他却是非常地重视。他的语言干净自然，较少做作，他要求自己“能不说的话就不说”。

# 常青的树 开不败的花

——“从头越”小说文库序

崔道怡

当代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，谁不熟知他们的名字，谁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呢？他们的书，二十年来，早已多次被这样、那样编辑、出版过了。而今，之所以把他们重新集结起来，是因为选取了“从头越”这么一个令人遐想的视角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这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写长征的词句，但它也涵概了历史与人生的一种境界。这九位有着特殊历史与人生历程的作家，各以其感受“雄关”之“铁”而后再“从头越”的体味，展现了这种境界的苦难与辉煌。个中滋味，是非亲历者所想象不出、所感受不到的……

五十年代中期以来，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，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。毛泽东主席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天地。当此时机，新中国第一批新作家展现才华，捧出了在当时曾引发巨大反响的锦绣篇章。王蒙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、李国文的《改造》、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、刘绍棠的《田野落霞》、从维熙的《并不愉快

的故事》……相继使人耳目一新，真个是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

但是，1957年5月15日，发动了“整风”运动的毛泽东主席，又发现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：“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。有共产党人——马克思主义者。有括弧里面的‘共产党人’，即共产党的右派——修正主义者。……他们越猖狂，对于我们越有利益。人们说：“怕钓鱼，或者说：诱敌深入，聚而歼之。”7月1日，他进一步指出：“有人说，这是阴谋。我们说，这是阳谋。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：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，才好歼灭它们，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，才便于锄掉。……‘言者无罪’对他们不适用。”随即在《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》中，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性质：“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，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。”

疾风暴雨横扫大地，“百花齐放”顷刻凋残。当初在“整风”中被鼓动提意见的作家，以揭示官僚主义等弊端为内涵的作品，遭遇到大劫难。反右派扩大化，把占总数百分之五的五十万知识分子，打下深渊。一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的作家，被劳改，被流放，甚至被关进了“大墙”。

天昏地暗，犹如月食。但天然月食，为时短暂，这一批“右派”作家的人生“月食”，却长达二十二年。“这二十多年，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幸而不死。”李国文平反后又二十多年，在其随笔里《如此这般》回首往事，传达了他们共同的感受：“山之高，水之深，暑之热，冬之冷，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痛苦的人间滋味，全领受个遍。”“一生中最好的岁月，最精华的，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，就这样虚度过去……”

尽管如此，事实证明：我国文人历来就有“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”的精神传统，他们是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”。坎坷摔打铮铮铁骨，苦难磨砺琅琅文情。这一批作家的冤案获得平反，立即复出，如泉喷涌，再次展现他们非同凡响的才智。仿佛是挤压于岩层中的古莲子，一旦重逢空气和水，便能照样绽开荷花，亭亭净植，香远益清。

事实上，早在改正前夕，王蒙就已创作了他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《最宝贵的》；李国文就已构思了他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制《冬天里的春天》……从那时起，直到如今，二十年间，姚黄魏紫，他们各有文集出版，平均每人三五百万精美文字流传于世。现在，我们把他们集起来，再次选优拔萃，更加精益求精，便会在总体上生发出异乎寻常、无可替代的社会与文学的认识作用、审美功能。

这一套文库，使我们首先可以感受得到：跨过了“真如铁”的“雄关”，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之后，这一批作家被积压了二十年的才华，不仅没有稍减，而且愈发锐利深沉。似乎是要对那“虚度”的岁月加倍地补偿，他们把青春年华的美与力储备着，汇聚到这得以放释能量的复出时期，凝结出这一代作家特有的最充实而瑰丽的贵重中年。这种“从头越”现象本身，就是历史转折的出色见证，就是人生跃进的超常景观。

总览九位作家近二十年这一系列代表性的著名篇章，我们能够再次采取他们彼此之间不约而同的相通之点。那就是：他们与人民同心，他们与历史同行。四十多年前，他们的蒙冤，重要原因之一，在于以作品传达了人民的心声。平反二十年，他们的创造，依然以为国为民、忧国忧民为主旨，对思想解放、改革开

放，起到了启蒙鼓劲、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。而那一篇篇洋溢时代气息、饱含生活情理的精神产品，又正是我国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，改革开放进程的画卷。

但他们又是各不相同的。在艺术特色上，论风格与流派，他们原就各有千秋；“从头越”后，又各有创新，发挥与发展了各自的专长：或以呼唤先锋新人耳目，或以倾心乡土引人关注，或以扩展题材别开生面，或以创建文体独具一格，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各领风骚的开拓者和带头人。聚会一处，他们又结为璀璨星座，构成了新时期文坛上的生力军和主力军。

正是这种有所相通又大不相同的艺术创造，使得他们相继不断走上各种各样文学评选的领奖台，被戏称为新时期第一批“获奖专业群体”。早年致祸之作，又早已作为“重放的鲜花”得到公正评价，二十年来获奖篇章或虽未获奖却同样厚重甚或更有独特风味的作品，无不焕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。当年毛泽东主席在提出“毒草”概念同时，却也发出预言：“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，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，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。正确的东西，好的东西，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，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。”这一预言，恰恰是在因炮制“毒草”而被打成“右派”的作家这里，得到了确定的证实，岂不令人深长思之。

那么，我们在“毒草”变香花、“右派”成主力这一个历史的坐标上，编辑、出版这一套“从头越”小说文库，其意图便也应不言而喻。我们相信，历史将进一步证明，我们在这里展示给读者的作家与作品，总体上是常青的树，是开不败的花。



## “若即若离”“我行我素”



林斤澜

我写小说，是断断续续的，一阵一阵的。开始写作的时间倒是颇早的。第一篇作品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发表的。那是沈从文先生所开“各体文习作”课上的作业，经沈先生介绍出去的……

（当时沈从文向文艺界介绍汪曾祺，有一句话流传成佳话：“他写的比我好。”评论家有道：“两个最可注意的年轻作家。”另一个是路翎。）

一九四六、一九四七年在上海，写了一些，编成一个“邂逅集”。

解放后长期担任编辑，未写作。一九五七年偶然写了一点散文和散文诗。一九六一年写了“羊舍一夕”。因为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出一个小集子（听说是萧也牧同志所建议），我又接着写了两篇。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写得多一些，这都是几个老朋友怂恿的结果。没有他们的鼓励、催迫、甚至责备，我也许就不

会再写小说了……

(摘自“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”，一九八二年，北京出版社出版。

“文革”恶梦过去两年后，北京文联在文化局饭厅一角，拉上布幕，放两张写字台，整理残部、收容散兵游勇。把文艺界说做“重灾区”，一点也不过。不久，北京出版社计划一套“北京文学创作丛书”老人新人，旧作近作，挨个儿出一本选集，这是摆摆阵容的壮举。有说，不要忘了汪曾祺。编辑部里或不大知道或有疑虑，小说组里问人在哪里，也素不认识。我说我来联系吧。其实就在本地本城，也就在文艺界内（京剧团）。连忙找到这位一说，不想竟不感兴趣，不生欢喜。只好晓以大义，才默默计算计算，答称不够选一本的。再告诉这套丛书将陆续出书，可以排列后头，一边抓紧点再写几篇。也还是沉吟着；写什么呀，有什么好写的呀……这么个反应，当时未见第二人。“自序”中说“就不会再写小说了”，似应添上一笔：“心神不宁”，甚至是“心灰意懒”。)

我写小说的资历应该说是比较长的，一九四〇年就发表小说了。解放以前出了个集子，但是后来中断了很久。解放后，我搞了相当长时间的编辑工作。编过“北京文学”，编过“说说唱唱”，编过“民间文学”。到六十年代初，才偶尔写几篇小说。之后一直没写，写剧本去了，前后中断了二十多年。一直到一九七九年，在一些同志，就是北京的几个老朋友，特别是林斤澜、邓友梅他们的鼓励、支持和责怪下，我才开始写了一些。第三次

起步的时间是比较晚的。因为我长期脱离文学工作，而且现在我的职务还是在剧团里……

（摘自“小说创作随谈”，“是在一次青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”。时间是八十年代之初。

这里用了“中断”两字。此处提到“第三次起步”，别处只分解放前后。这里说到第一次中断的原由，详述了“编辑工作”。第二次中断是：写剧本去了。怎么写起剧本来呢？是给放到京剧团去了。怎么去的京剧团呢？这里有一个一迈二十年的“坎儿”。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？怎么不说明白一点。）

我自二十岁起，开始弄文学，蹉跎断续，四十余年，而发表东西比较多，则在六十岁以后，真也够“费劲”的。“呜呼，可谓晚矣……”

（“晚翠文谈”自序。一九八六年出书。书稿转了个出版社，耽搁了不少日子。这里多了个“蹉跎”，多了个“费劲”，多了一声“呜呼”。）

我是四十年代开始写小说的。以后是一段空白。六十年代初发表过三篇小说。到了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，而且一发而不可收，发表小说的数量不少。这个现象有点奇怪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

（“汪曾祺文集自序”，一九九三年。

这是九三年了。虽提出了问题，也还没有正面答复。只说到文学口号，把“为人生”变做“为政治”，“限制了作家的思想”。

评论家、文学史家有的注视这个“中断”，以为不只是个人遭遇，是几代作家一起的“中断”现象。虽分“戴帽子”“不戴帽子”，但都要脱胎换骨，走上规定的道路。从此有的“断”在那里再也回不来。或是身体回来了，思维却僵在那里。或是僵倒不算僵，才华可是磨灭了。有以为像汪曾祺那样既早熟又晚成的，“中断”更有“典型”意义。史家叹道，可惜“炒作者多多，研究者寥寥”。)

我当了一回右派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

(“随遇而安”，一九九一年作。

这里摘引的是开头几句。后边叙述经过，几无凄楚之词，亦无愤懑之声，倒落笔在下放劳动中，深入底层，接触民情的多种情趣。有几句解题的话——)

×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，是“逆来顺受”。我觉得这太苦涩了，“随遇而安”更轻松一些。“遇”当然是不顺的境遇，“安”也是不得已，不“安”，又怎么着呢？既已如此，何不想得开些。如北京人所说：“哄自己玩儿。当然，也不完全是哄自己。生活，是很好玩的。”

(接着说“受过伤的心”，“他们对世事看淡了，看透了，对

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。”

曾祺在“七十书怀”诗中，有一联是：“书画萧萧余宿墨，文章淡淡忆儿时。”多次“自序”中，说到“中断”，淡得差不多“淡出”了。但别人把个“淡”字说他，往往又回道：“把我说得食人间烟火似的。”他也确有提刀四顾，破口叫阵的时候。我以为“淡”与“不淡”，都是实情。只怪他自己笔下讲究“沉淀”，排除“浮躁”。这篇文章的最后两句是：)

为政临民者，可不慎乎。

(淡呢不淡？再如逆来顺受的苦涩，随遇而安的轻松，等等，都是各自不同的感受，和各自的气质相关。但“客观现实”只有一个，这就有了比较，比如距离现实的较远或较近。)

(汪曾祺辞世，高邮县文联和亲属晚辈到北京来吊唁，有两个青年问我几句话，当时不及考虑也不便细答。过后想来，连家乡人也只知“晚成”不大了解“中断”，无视“早熟”。

评论家研究家也有的只知八〇年《受戒》一发表，受到“欢迎”和“赞誉”。八一年发表了《异秉》，更加令人“扩展”“视野”，“开拓”“思路”，“了解”“传统”。

不知七九当年“乍暖还寒”，还有汇报“思想新动向”的会议，过来人都知道这种汇报念的是什么咒。有个单位把写“小和尚谈恋爱”的小说，当作动向例举出来。“北京文学”负责人灵机一动，要过来看看，《受戒》这才出世。《异秉》由我介绍给南京《雨花》新任主编叶至诚、高晓声，说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

情。他们两位十分欣赏，却不知道江苏有这么个作家，不知道四十年代的名声，要我找机会引见。过了三几个月，未见发表出来，一问，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。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稿子，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。这意思不是离发表水平差一点，而是根本不是小说。后来还是主编作主发出去，高晓声破例写了个“编者按”，预言这篇小说的意义。汪曾祺看了“编者按”说：懂行。直到八十年代后期，文论结集“晚翠文谈”，先应约交给北京出版社。竟又通不过。责任编辑舍不得也不好意思退稿，走来和我商量，眼睛都红了。我说交给我，略加整理，添了两篇新作，介绍到浙江出版社。出书已经是八八年了。八十年代末还有这种情况。“中断”决不是空白。“晚成”也不是立地成佛。“为‘文’临民者，可不慎乎。”可不设想如若不发生几代人一起的“中断”，精神领域会是什么样子。）

三十多年来，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，有时甚至完全隔绝，这也有好处。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，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。我当时没有写东西，不需要赶任务，虽然也受错误路线的制约，但总还是比较自在，比较轻松的。我当然也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，但是并不“应时当令”，较易摆脱，可以少走一些痛苦的弯路。文艺思想一解放，我年轻时读过的，受过影响的，解放后被别人也被我自己批判的一些中外作品在我心里复苏了。或比照现在的说法，我对这些作品较易“认同”。我从弄文学以来，所走的路，虽然也有些曲折，但基本上能做到我行我素。

（“晚翠文谈”自序，一九八六年。

“三十多年来”“也有好处”，“总还是”“比较轻松”，还“比较自在”了。因为“并不”“应时当令”。怎么身不由己的“样板戏”遭遇，“应时当令”之极，也“淡出”了。连同一旦“由己”，否定“三突出”的彻底之至，也忽略了。

也许“心平气和”是作家的难得的“气质”。但研究家却要面对绝不平和的现实，如先哲说的“一个也不宽恕”。)

我没有对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。我知道，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，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，写不出大作品，写不出有份量、有气魄、雄辩、华丽的论文。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。一个人的气质：不管是由先天或后天形成，一旦形成，就不易改变。人要有自知。我的气质，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。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。我写的一切，都是小品。就像画画，一个册页、一个小条幅，我还可以对付；给我一张丈二匹，我就毫无办法。

（“晚翠文谈”自序，一九八六年。

曾祺多次给自己“定位”，每次“定”的“位”都差不多。这次在八十年代后期，是晚年，可以有所“定论”了。曾祺是少有的、毕生专攻短篇的作家。早在四十年代，才二十六七岁的时候，好像就有了“自知之明”。一九四七年发表的“短篇小说的本质”中，先说长篇小说：)

从来也没有一个音乐家想写一个连续演奏十小时以上的乐章吧，（读战争与和平一遍需要多少时候？）而我们的小说家，想做

不可能的事。看他们把一厚册一厚册的原稿销毁，一次一次的重写，我寒心那是多苦的事……

(接着说短篇，出来一组警句：)

一个短篇小说，是一种思索方式，一种情感形态，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。

(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抗日时期，在西南联大开课讲短篇小说中间，从“官面价值”“市面价值”分析出来短篇“无出路”。就因“无出路”，写短篇的和长篇中篇作家不一样了，只能贴近艺术，献身艺术。汪曾祺顺着这条思路，以年轻的嗓音呼唤新的艺术。)

我们设想将来有一种新艺术，能够包融一切，但不复是一切本来形象，又与电影全然不同的，那东西的名字是短篇小说。这不知甚么时候才办得到，也许永远办不到。至少我们希望短篇小说能够吸收诗、戏剧、散文一切长处，而仍旧是一个它应当是的东西、一个短篇小说。

(那么给自己“定位”，除了“气质”，还应当包含“思索”。虽是“小品”，却有“大义”。那么年轻时候，就有了贯穿终生的“自知”？可不可以设想这早早的“自知”之明，在“蹉跎断续”的一生中，其实也起了“自律”作用。早年就生心写个小长篇；历史小说“汉武帝”。酝酿到“只写三件事”，成熟到“只写三个



场面”。直到“七十述怀”，“假我十年闲粥饭”，要做的几件事中，有一件是“汉武帝”。七十七喜寿，也还没有动手。“自知”呢？“自律”呢？无论什么都是可惜的事情。新近的纪念文章中，多由衷的赞扬，不去“定”不“定位”。也有少数论者，大致和他的“自我定位”相似。也有从文学史的角度，认为是“断而复续”中“一个不可或缺的联结点”。“一个历史复杂关系的象征”。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自选集自序中，写道：)

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。

(这个意思的话，在曾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文章里，反复出现，加上自以为“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”。再加上文字日益“平实”“平易”。是不是叫人觉着他的作品“美”而“浅显”？

可不那么简单，曾祺还认为过多考虑“作品的内涵”，会带来“概念化”，带来“思想大于形象”，还说到“图解”那里去。他从来主张“沉淀”，“去掉浮躁”，“沉淀”到仿佛“童年回忆”。这样的“沉淀”不光靠时日推移，在于“思索”，“反复思索”。单单一个猫的故事，思索了六七年。那小和尚的恋爱，写的是四五十年前的初恋。曾祺在最后的日子里，说把先前用“思索”的地方，改用“凝视”，因为“凝视”更带感情。

那么“追求和谐”，不“追求深刻”的话，就不能只归到“浅显”里去了。

我的看法是“有感而发”，是针对文学现状，提出清醒也是清静的主张。

开放以来，思路潮涌，思家蜂起，文学道路上，虽说应接不